

##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的國是關切

● 趙 波

西南聯大及其教授群體，為中國教育、科技、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發展，做出了特殊貢獻。謝慧從1930至40年代西南聯大教授創辦的《今日評論》入手，深入剖析了他們對國是的關切，描繪了他們在國難當頭時的心路歷程。



謝慧：《知識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評論〉與抗戰時期中國政策的抉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近十年來，無論是從教育史角度，或是從文化史、思想史角度，對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其教授群體的研究，已有成為顯學之迹象。僅歷八年但燦爛一時、澤及後世的西南聯大及其教授群體，為中國教育、科技、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發展，做出了特殊貢獻，自然引起近年來後人的深入研究。其中，

有學者另闢蹊徑，從1930至40年代西南聯大教授創辦的一份雜誌入手，深入剖析了他們對國是的關切，描繪了他們在國難當頭時的心路歷程。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謝慧博士《知識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評論〉與抗戰時期中國政策的抉擇》（以下簡稱《救亡努力》，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的主要內容。從已有研究成果看，學界對於《今日評論》這樣一份反映高等知識份子思想狀況的刊物，尚未給予充分的關注和研究，而《救亡努力》一書正有填補空白的作用。

### 一 評論時局，凸顯價值

作為民國時期的雜誌，與今人耳熟能詳的《新青年》、《觀察》、《獨立評論》等刊物相比，《今日評論》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它誕生於1939年元旦一群西南聯大知名教授之手，停刊於1941年4月，共出版5卷114期，發起人及主編為錢端升。錢端升是中國現代政治學的開創者，1920年代就奠定了在中國政治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著作有《法國的政治組織》、《比較憲法》、《民國政制史》等。他二十四歲即獲得哈佛大學政

治學博士學位，後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曾參與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

《今日評論》的作者，則因其西南聯大教授群體的背景而令人嘆為觀止——如錢端升、羅隆基、王贛愚、羅文幹、陳之邁、費孝通、潘光旦、鄒文海、吳文藻、馮友蘭、朱自清、傅斯年、陳岱孫、王迅中、錢穆、陳序經、錢鍾書、呂叔湘、張佛泉、蕭公權、雷海宗、林同濟、伍啟元等等。上述人物中的任何一位，都是鼎鼎大名，都是中國近代政治、文化、法律、經濟、歷史、語言等學科研究中的翹楚。有這樣一群學貫中西、知識淹博的教授擔任撰稿人，何愁稿件質量，又何愁影響不廣？

的確，經過錢端升等人的不懈努力，在當年半個中國國土淪陷、人民生活極其艱難、刊物郵遞困難的情況下，《今日評論》不僅每週能銷到將近四千份，還遠銷到香港和國外，成為一份富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政論刊物。美籍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指出，「從1938年至1940年，思想界之活躍是後期無可企及的。1938年春開始，一群北平最有名望的學者相繼來到昆明，改變了這裏的知識份子地圖。……在戰爭初期那些刊物中，最突出的就是錢端升的《今日評論》，……這份雜誌成為了吸引聯大知識份子討論時事的論壇。」(頁25)

在兩年多的刊行時間裏，《今日評論》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可分為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等八類，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作者對於時政的關注，使得《今日評論》成為

反映和回應複雜多變的政治時局的重要窗口，對抗戰時期中國政治的種種設計和建議也有重要價值。其中，尤以憲政、經濟和外交三問題為焦點。

首先，就憲政問題而論，《今日評論》的出版，正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第一次憲政運動時期，其自身也就成為那次憲政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今日評論》的作者，不僅熱情討論憲政、民主、自由、法制、統一等問題，而且親身參與憲法草案的起草、出席憲政促進會，並在憲政運動結束後繼續關注有關問題。與同期討論憲政的刊物相比，《今日評論》不僅相對獨立，而且作者群的理論水平、政治活動能力以及參與程度，都較其他雜誌為高，體現了西南聯大知識份子在抗戰時期對民主政治的迫切追求和深入思考。

值得肯定的是，西南聯大教授討論憲政問題時，非常重視民智的開啟、民眾的自覺和人民能力的培養。比如，錢端升認為，「問題的本質就是使人民懂得，政治並不僅僅是那些掌權的人或天生享有特權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所關心的事情。只有當人民獲得了生活的手段以及在政治活動中獲得利益時，民主才能實現。」(頁93)法律系教授林良桐認為，「憲政的目的，簡單說來，在使全國民眾共同擔負國家的責任，民眾漠不關心，憲政就不會完成。……要使人民負起國家的責任，必須經過相當時期的組織，必須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頁95)也就是說，《今日評論》作者群對於憲政的視角，不是政府架構、權利分配、人員組成等形而下的問題，而是延續了中國近代以來知識份子

在兩年多的刊行時間裏，《今日評論》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作者對於時政的關注，使得《今日評論》成為反映和回應複雜多變的政治時局的重要窗口，對抗戰時期中國政治的種種設計和建議也有重要價值。

《今日評論》作者群對於憲政的視角，不是政府架構、權利分配、人員組成等形而上的問題，而是延續了中國近代以來知識份子關注的開民智、增民力、益民權等形而上的問題，恰恰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憲政文化史中的主線和關節點。

關注的開民智、增民力、益民權等形而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憲政文化史中的主線和關節點。

其次，就經濟問題而論，《今日評論》的作者認為戰爭時期，經濟是軍事的基礎，不僅關係到人民生活，更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他們討論的重點集中在戰時經濟建設的幾個基本原則，如區分輕重緩急，以關係軍事和民生的經濟建設為主；強調戰時政府一定要統制經濟，尤其是統制物價；針對以農立國的論點，強調戰時應推動工業化，提出發展西南工業和農業機械化。總體而言，他們所關注的，是在戰時艱苦卓絕的情況下，如何有效調動、合理利用中國有限的資源，來堅持抗戰、維持國力。比如，經濟系主任陳岱孫教授強調，「我們必須阻止一切足以消耗經濟力的行為，而鼓勵一切足以增長經濟力的行為。」(頁212)《今日評論》的另一重要參與者政治系王贛愚教授也強調統制經濟的必要性，「統制經濟亦是事實的要求，勢在必行……中央政府於實行統制經濟之中，力謀全國工業化，似乎較前容易得多。」(頁246-47)

需要指出的是，六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討論經濟問題時，其理論來源多是西方經濟學(宏觀和微觀)，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研究重點是資源稀缺性與人的欲望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今日評論》教授群對經濟的關注，顯然受儒家傳統「經世濟民、富國強民」的影響，自覺把「經濟」問題放到國家建設、改善民生、抵禦外侮的高度。

最後，就外交問題而論，受當時抗戰影響，《今日評論》自然十分注意對日觀察和抗日策略。以西南聯大教授、中日外交史專家王迅中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根據日本國內外局勢的變化，指出日本已經內外交困，未來勝利必然屬於中國，從而有力地駁斥了一些政客和文人叫囂的「投降論」、「亡國論」、「曲線救國論」。同時，因《今日評論》作者多數留學美國，對美國政治較為了解，因此強調美國對中國的義務和美援的重要性，不僅指出美國應審慎考慮並改變「孤立」政策，而且指出對話援助實際有利於美國，是雙贏行為。

錢端升則更有前瞻性地提出應考慮戰後如何重建世界秩序及中國戰後地位等問題，可謂目光如炬。他一直認為中國應當通過這次大戰取得大國地位，依據就是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與其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對稱，而中國的抗戰是對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我國與英美隱隱然成為三大洲的三大主角，三大同盟。」(頁367)能在抗戰正酣、形勢尚未明朗之際，具備世界眼光，提出如斯觀點，今天讀來仍令人欽佩不已。

## 二 知識份子的「評論」及其他

《今日評論》創辦之時，恰逢中國思想活躍和複雜的時期，雲南的局勢和西南聯大的特殊地位又為其提供了相當寬鬆的言論環境，營造了比較自由的輿論氛圍，使雜誌帶有明顯的時代氣息。《今日評論》的

作者群，無疑與宋明時期那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清談者迥異，而是承繼了中國優秀知識份子「坐而論道、評說天下」的傳統，反映出知識份子一貫的關注時政、暢論國是的使命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1940年代中期，《今日評論》作者群中的二十多人參加了另一份著名刊物——《觀察》，繼續為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鼓與呼。

1940年代前，知識份子參政的渠道主要表現在輿論上、在對報刊的利用上。《努力週報》、《現代評論》、《新月》、《再生》、《自由論壇》等都是著名的知識份子政論刊物，對中國政治文化環境起到了影響和滲透的作用。實際上，這些未進入政壇高層的知識份子，並沒有多少干預時政的能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年知識份子創辦的雜誌單就其名稱而言就值得研究，就是以「評論」二字命名的雜誌屢見不鮮，如《獨立評論》、《當代評論》、《現代評論》、《今日評論》等等。「評論」一詞，能體現評說者「旁觀者清」和「出山要比在山清」（丁文江語）的優勢。大凡「評論」，評說者必有所依、有所本，要麼是舊學者儒對傳統文化理解甚深，要麼是新學中堅對西洋文化領略頗多，要麼是二者兼有、交相輝映，其評說內容也多是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息息相關的話題。

近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體制和模式，在與海外教育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中「短板」盡顯、備受關注、飽受爭議，再返觀1930至40年代抗戰時期，雖然物質

匱乏、資金短缺、信息有限，但西南聯大的學術研究雲蒸霞蔚，學術大師冠絕一時，學術品德令人仰止。

近年學者對於西南聯大的研究範圍，從校史研究、教育史、思想史到文化史，涵蓋廣泛，不一而足。僅從思想史角度而言，眾多研究者指涉的問題，是西南聯大的成功與其知識份子群體的自由主義精神有莫大關聯。應該說，這不僅是對於西南聯大史、近代教育史，更是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的論題。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正確理解這個自西方舶來的「自由主義」。當然，這不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需要指出的是，僅從校訓角度來觀察，無論是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抑或是清華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還是南開的「日新月異，允公允能」，均集中體現了學術研究與思想觀念的獨立性、民主性和平等性。正如陳寅恪指出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而這種學術研究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將「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參見陳寅恪1929年所作王國維先生紀念碑銘）。也就是說，真正的研究工作，真正的學者，不是急功近利，曲學阿世，以學問博得封妻蔭子，而是踏踏實實地解決中國文化、中國學術中的重大關鍵問題。

寫到此處，說些題外話。筆者初讀《救亡努力》時，即感慨於作者謝慧選題之妙、閱讀之寬、論析之精。但作者完成此書後不久即因病而逝，享年三十歲，不禁令人嘆惋。

僅從思想史角度而言，眾多研究者指涉的問題，是西南聯大的成功與其知識份子群體的自由主義精神有莫大關聯。這對西南聯大史、近代教育史和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正確理解這個自西方舶來的「自由主義」。